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李旭辉 彭现美 马成文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 通过构建一个两部门经济模型,并在增长核算框架下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1953—201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0.43%和14.78%。分阶段看,不同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截然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行政命令引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为负,而改革开放后由市场机制引导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其贡献率呈快速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该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职业培训和户籍制度改革等诸多方面做出努力,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 劳动生产率; 就业份额;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2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60(2018)04-0046-11

DOI: 10.19337/j.cnki.34-1093/f.2018.04.005

一、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问题备受关注。众多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国家间人均收入的差异主要源于生产要素和技术进步的差异。因此,一国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积累以及采用(引进)先进的技术促进经济增长(Solow,1956;Lucas,1988;Romer,1990)。这些早期的研究假设市场是完善的,资源能够自由流动,从而实现最优配置。然而,近期的一些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往往是不完善的,生产要素并不能实现自由流动,资源误配(misallocation)使得相同的生产要素在同一经济体内存在巨大的回报率差异(Banerjee et al. 2005)。因此,除技术进步外,市场完善(资源错配)程度为观察到的国家(地区)间劳动、资本报酬和人均收入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Caselli 2005;Alfaro 2008;Brandt et al., 2009;Hsieh et al. 2009)。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庞大而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新兴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经济发展伴随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人口迁移过程(Lewis, 1954;Ranis et al.,1964;Harris et al.,1970)。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改善了部门间的要素配置(降低了资源错配程度),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伴随着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这样一个过程,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包括农村劳动力转移对输出地和输入地的影响(李实,1997;李俊锋等,2005;龚玉泉等,2002;陈朔等,2005)、对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杜鑫,2010;樊士德,2014)、对地区间(城乡)收

收稿日期:2017-11-03

作者简介:李旭辉(1981—),男,山东烟台人,安徽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彭现美(1971—),男,安徽宿州人,博士,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马成文(1965—),男,安徽亳州人,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转移劳动力体面劳动现状、评价与对策选择研究”(12BRK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放经济条件下纳入资源环境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14CTJ006)。

入差距的影响(姚枝仲等 2003;段均等 2011),以及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胡永泰,1998;潘文卿,1999;蔡昉等 2001;李勋来等 2005;张广婷等 2010;齐明珠 2014)。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以往的研究:首先,通过构建两部门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作用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渠道,并运用增长核算方法证实理论模型的推论。其次,采用跨度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分时期探讨不同阶段(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变化。最后,通过与以往其他学者的研究进行横向对比,突出本文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证实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二、理论框架和方法

(一) 增长核算: 两部门框架

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借鉴了 Chenery et al.(1986)和张广婷等(2010)。假设经济中有两个生产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经济总产出 $Y = AL$, 其中 $S = A$ 表示(劳动)生产率, L 表示劳动力数量(就业人口)^①。与此相对应,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为 $Y_a = A_a L_a$, 非农部门的生产技术为 $Y_{na} = A_{na} L_{na}$, 其中 A_a 和 A_{na} 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 L_a 和 L_{na} 分别表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就业人口,并满足 $L_a + L_{na} = L$ 。对总产出函数 $Y = AL$ 两边同时取对数:

$$\text{Log } Y = \text{Log } A + \text{Log } L \quad (1)$$

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

$$\frac{\dot{Y}}{Y} = \frac{\dot{A}}{A} + \frac{\dot{L}}{L} \quad \text{或} \quad g_Y = g_A + g_L \quad (2)$$

总产出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之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记为 $C_A = g_A/g_Y$ 和 $C_L = g_L/g_Y$ 。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劳动力增长率取决于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力转移(部门间流动)无关^②。因此,劳动力转移将通过作用于劳动生产率这一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做下述分解:

$$A = \frac{Y}{L} = \frac{Y_a + Y_{na}}{L_a + L_{na}} = \frac{Y_a}{L_a} \frac{L_a}{(L_a + L_{na})} + \frac{Y_{na}}{L_{na}} \frac{L_{na}}{(L_a + L_{na})} \quad (3)$$

令 $\delta_a = \frac{L_a}{(L_a + L_{na})}$, $\delta_{na} = 1 - \delta_a = \frac{L_{na}}{(L_a + L_{na})}$, 式(3)可以简化为:

$$A = A_a \delta_a + A_{na} \delta_{na} \quad (4)$$

对式(4)两边取自然对数得: $\log A = \log(A_a \delta_a + A_{na} \delta_{na})$ 。两边同时对时间求导:

$$\begin{aligned} \frac{\dot{A}}{A} &= \frac{1}{(A_a \delta_a + A_{na} \delta_{na})} (\dot{A}_a \delta_a + A_a \dot{\delta}_a + \dot{A}_{na} \delta_{na} + A_{na} \dot{\delta}_{na}) \\ &= \frac{1}{(A_a \delta_a + A_{na} \delta_{na})} \left(\frac{\dot{A}_a}{A_a} A_a \delta_a + \frac{\dot{\delta}_a}{\delta_a} A_a \delta_a + \frac{\dot{A}_{na}}{A_{na}} A_{na} \delta_{na} + \frac{\dot{\delta}_{na}}{\delta_{na}} A_{na} \delta_{na} \right) \\ &= \theta_1 \left(\frac{\dot{A}_a}{A_a} + \frac{\dot{\delta}_a}{\delta_a} \right) + \theta_2 \left(\frac{\dot{A}_{na}}{A_{na}} + \frac{\dot{\delta}_{na}}{\delta_{na}} \right) \end{aligned} \quad (5)$$

其中 $\theta_1 = \frac{A_a \delta_a}{(A_a \delta_a + A_{na} \delta_{na})}$, $\theta_2 = (1 - \theta_1) = \frac{A_{na} \delta_{na}}{(A_a \delta_a + A_{na} \delta_{na})}$ 。令 g_x 表示变量 x 的增长率,则式(5)可以简化为:

① 在这一简单的函数设定下, A 实际上隐含了除劳动力数量之外的一切其它影响产出的因素的贡献。

② 实际上,劳动力部门间流动可能导致家庭生育决策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人口结构和就业人口增长率。为了简单起见,本文忽略了这种可能。

$$g_A = \theta_1 (g_{A_a} + g_{\delta_a}) + \theta_2 (g_{A_{na}} + g_{\delta_{na}}) \quad (6)$$

由式(6)可知,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 $\theta_1 g_{A_a} + \theta_2 g_{A_{na}}$,第二部分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就业份额变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 $\theta_1 g_{\delta_a} + \theta_2 g_{\delta_{na}}$ 。

(二)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如果农村劳动力转移仅仅影响两个部门就业份额增长率,那么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可简单地表示为:

$$K_A = \frac{\theta_1 g_{\delta_a} + \theta_2 g_{\delta_{na}}}{g_A}, K_Y = \frac{\theta_1 g_{\delta_a} + \theta_2 g_{\delta_{na}}}{g_Y} \quad (7)$$

这一简单情形对应于张广婷等(2010)。然而,式(7)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首先,部门实际就业份额变化由部门从业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转移率决定,将部门就业份额变化完全归功于劳动力转移可能会高估了其贡献。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会影响部门就业份额增长率,而且会影响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式(7)忽略了劳动力转移对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此,很可能低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贡献。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还会影响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份额本身(水平效应),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作用于参数 θ_1 和 θ_2 ^①。

为了更为准确地度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贡献,克服式(7)可能存在的缺陷,本文做出以下修正:

(1) 估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各部门就业份额变化的实际贡献。如果不存在劳动力转移,那么乡村劳动力将全部滞留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份额 δ_a 将与乡村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份额 δ_r 相等,非农部门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份额 δ_{na} 与城镇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份额 δ_u 相等,即 $\delta_a = \delta_r$, $\delta_{na} = \delta_u$ 。如果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部门,则有 $\delta_a < \delta_r$, $\delta_{na} > \delta_u$ 。因此 δ_a 和 δ_r , δ_{na} 和 δ_u 之间增长率的差异 ($g_{\delta_a} - g_{\delta_r}$, $g_{\delta_{na}} - g_{\delta_u}$) 才真正度量了劳动力转移对各部门劳动力份额变动(增长率)的实际贡献。

(2) 估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假设不存在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以 α_0 的速度增长,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将以 β_0 的速度增长,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率为 g_{A_a} ,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率为 $g_{A_{na}}$ 。那么劳动力转移对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和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C_{TA_a} = \frac{(g_{A_a} - \alpha_0)}{\alpha_0} \quad (8)$$

$$C_{TA_{na}} = \frac{(g_{A_{na}} - \beta_0)}{\beta_0} \quad (9)$$

$$C_{TY_a} = \frac{(g_{A_a} - \alpha_0)}{g_{Y_a}^0} \quad (10)$$

$$C_{TY_{na}} = \frac{(g_{A_{na}} - \beta_0)}{g_{Y_{na}}^0} \quad (11)$$

其中 $g_{Y_a}^0$ 、 $g_{Y_{na}}^0$ 分别表示没有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农业部门、非农部门产出的增长率。根据上述两部分修正,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表示如下:

$$C_{TA} = \frac{\theta_1 [(g_{A_a} - \alpha_0) + (g_{\delta_a} - g_{\delta_r})] + \theta_2 [(g_{A_{na}} - \beta_0) + (g_{\delta_{na}} - g_{\delta_u})]}{g_A} \quad (12)$$

$$C_{TY} = \frac{\theta_1 [(g_{A_a} - \alpha_0) + (g_{\delta_a} - g_{\delta_r})] + \theta_2 [(g_{A_{na}} - \beta_0) + (g_{\delta_{na}} - g_{\delta_u})]}{g_Y} \quad (13)$$

① 因此,参数 θ_1 和 θ_2 是两个变量(随时间变化),而不是两个常数值。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和变量界定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主要指标包括:全国总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乡村就业人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所有指标的时间跨度为1952—2013年。本文核心变量界定如下:根据中国的统计口径,我们将农业部门界定为第一产业^①,即农业部门产出和就业人数等于第一产业产出和就业人数。第二、三产业则对应于非农部门,非农部门产出和就业人数等于第二、三产业的产出和就业人数总和(或等于总产出和总就业人数与第一产业产出和就业人数之差)。将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定义为乡村就业人口中从事二、三产业的数量,它等于乡村就业人数减去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本文对所有名义变量按照1950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份额等其它变量^②。

(二)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路径

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978年)为临界点,我们将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内的不同时间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反映了该时期特有政治、经济、产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规制政策的特征。图1描述了1952—201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农就业)的演变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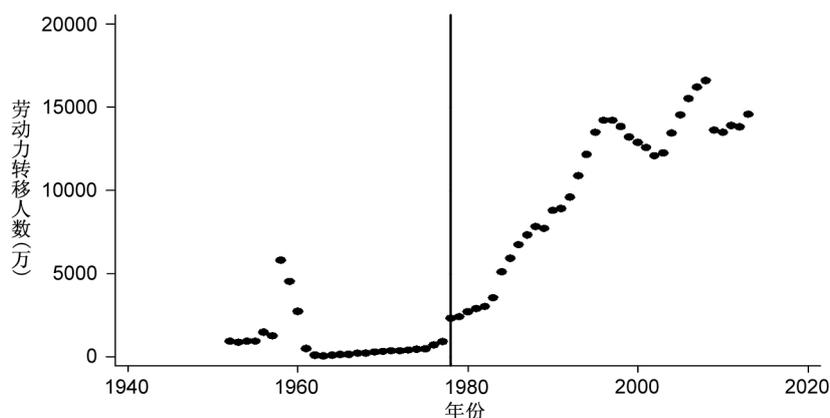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非农就业人数)(1952—2013)

1. 改革开放前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阶段(1952—1978)

该时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体特征表现为:转移数量较少,增长缓慢,唯一出现大幅波动的时期集中在“大跃进”期间(1958—1960)。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期(1952—1957)内,虽然国家并没有出台一系列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但该时期劳动力转移数量很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全国百废待兴,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农村地区,进行土地的集体化改革,成立初级社、高级社,继而建立人民公社。城镇地区,对私营个体户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经济,为社

^① 不同国家对三次产业的划分不同,对第一产业的界定也存在差异。通常第一产业是指以自然力为主,不必深度加工就可消费的产品和原料部门。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将采矿业、制盐业等也划入第一产业范畴。根据中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的标准,中国将第一产业界定为农林牧渔业(不包含农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被归类到第二产业。因此,第一产业恰好对应于(广义)农业部门的范畴。

^②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本文全部的原始数据和数据处理流程。

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大跃进”时期(1958—1960),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出现一次大跳跃,1958年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就业人数从1957年的1257万人跃升至5810万人,在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赶英超美”的激进口号和社会氛围下,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就业的人数激增,该时期流入到城镇的人口也出现了增长。1958年以后,中国开始执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按户籍将居民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实施不同的就业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镇。随着中央逐步意识到“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开始引导各地区劳动力回归正常生产工作,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人数逐步回落,“大跃进”结束后的1961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降至507万人。1961—197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停滞,17年间大多数年份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就业人数低于500万人,到1977年农村劳动力中非农就业人数仅增至907万人。

2. 改革开放后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阶段(1978—2013)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出现显著增长,总体特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剧增,部分时期出现阶段性逆行趋势。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8),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迅速增长。1977年底在安徽小岗村发起的家庭承包制成效显著^①,迅速在全国范围广泛施行,“留足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这一制度安排极大地激励了农户的积极性,农业产出实现了大幅增长。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内“隐性失业”问题也显现出来,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非农领域寻找就业机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乡镇企业发展,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80年代中期开始,农业增收减缓,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到非农生产,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征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1989—1991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短暂的停滞徘徊时期,经过了改革开放后第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中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逐渐凸显,1989年开始的一系列风波和整顿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短暂逆行(1989年转移人数出现小幅下降)和停滞徘徊(1990年和1991年)。随着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1992—1997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重新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年均增幅1000万人以上。随后的1998—2003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出现一段下行时期,1997年底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了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众多出口导向型企业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出现下降。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城镇工人下岗,城镇自身的就业矛盾凸显,部分转移的农民工出现回流,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剧减。2004—2008年中国经济重新迈入一段高速增长期,沿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又出现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两个农村劳动力转移量高速增长时期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始的头10年的那段高速增长期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前一个时期表现为就地转移,后两个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剧增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跨地区流动,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流动。2008年底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使得2009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出现大幅下降(民工返乡潮)。此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出现了小幅恢复性增长。目前将近4亿的农村劳动力中,大约有1.5亿从事非农产业^②。

(三) 中国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就业份额的历史路径

图2描绘了1952—2013年中国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路径,二者呈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大跃进”期间(1958—1960)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就业份额出现了剧烈震荡,1957年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为0.81,1958年降至0.58,与此同时,非农部门的就业份额则从1957年的0.19上升到1958年的0.42,一年间总劳动力中的23%从农业部门转移至非农部门。这一时期,经济畸形发展,劳动力盲

^① 早期这一制度安排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改为“家庭承包制”。

^② 我们仅仅分析了统计口径中被界定为农村劳动力(乡村就业人员)从事非农就业的情况,实际上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放松,一些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留在了城市中,获得了市民身份,从而不再属于农村劳动力的范畴。注意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就业人数增幅减缓,城镇就业人数开始加速上升,尤其是2000年以来,乡村就业人数出现了大幅下降,而城镇就业人数则出现大幅上升,从2.3亿迅速增至当前的3.8亿人。城乡劳动力数量的一增一减得益于户籍制度的放宽和大规模城镇化。

目转移,农业生产出现严重衰退,从而导致了1959—1961的三年“大饥荒”^①。经过一系列调整,1962年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就业份额又重新回到了1957年“大跃进”运动前的水平。1962年开始农业部门就业份额整体上呈下降趋势,非农部门就业份额呈上升趋势,1978年以后两个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动趋势更为显著,1996—2003年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就业份额基本持平。2004年开始,农业部门就业份额急剧下降,非农部门就业份额快速上升,非农部门就业份额从那时起超过了农业部门就业份额,随后二者差距呈明显的扩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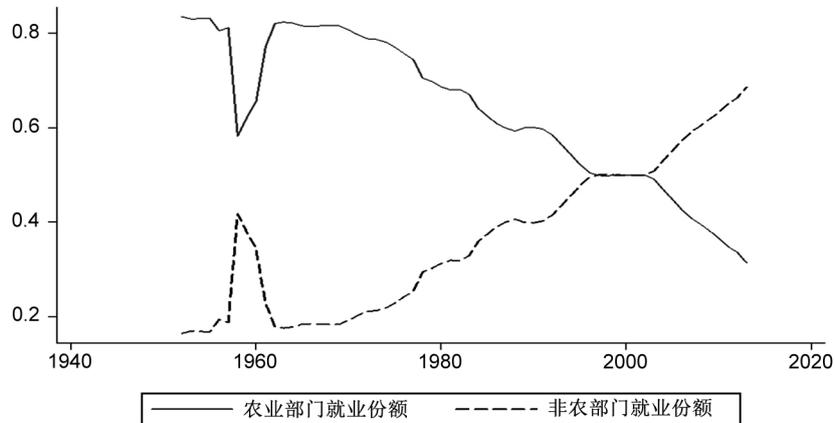


图2 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就业份额(1952—2013)

(四) 中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历史路径

本文理论部分的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将导致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份额发生变化,进而作用于总劳动生产率,并通过这一渠道影响经济增长^②。图3和图4分别描述了中国1952—2013年(包含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演变路径。图3显示,总劳动生产率作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介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之间。20世纪90年代之前,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前,总劳动生产率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非常接近,这与该时期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非常高的历史事实相符。自1990年经历了一次短暂的下降后,总劳动生产率开始迅速增长,并逐步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拉开距离,开始越来越接近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并且增长路径也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相似。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之前经历了数次明显的波动,包括1958年开始的一次剧降(“大跃进”运动)和1967年开始的另一次下降(“文革”的头3年)。从90年代开始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开始加速增长,尤其在经历了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那一小段增速减缓期后,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呈现跳跃式增长,迅速拉大了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距。改革开放(实施家庭承包制)之前,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比较缓慢,虽然没有像非农部门那样经历多次大幅波动,但1952—1978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5%。推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经历了较平缓的波浪式增长,包括80年代前半段的平缓增长和后半段的平缓下降,以及90年代前半段的增长和90年代末期的小幅下降。从2001年开始,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开始呈现明显的增长势头,2001—2013年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高达11.7%(1978—200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9%)。究其原因,该阶段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很可能得益于新时期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调整。

图4显示了国内生产总值、农业部门生产总值和非农部门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1952—1978年改

^① 众多学者对大饥荒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参见《经济学(季刊)》(2010)的专题研讨。

^② 与此同时,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工资差异)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动因,早期大多数人口迁移模型中,收入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之前的 20 多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农业部门生产总值和非农部门生产总值的增长均非常缓慢,三者几乎重叠在一起。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80 年代中期开始,非农部门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近乎同步,呈现高速增长。虽然农业部门生产总值在此期间也呈现比较明显的增长,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非农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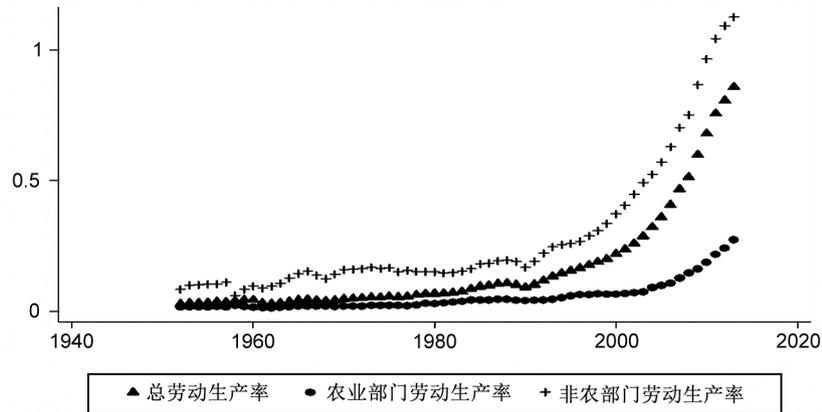


图 3 中国总劳动生产率和部门劳动生产率(1952—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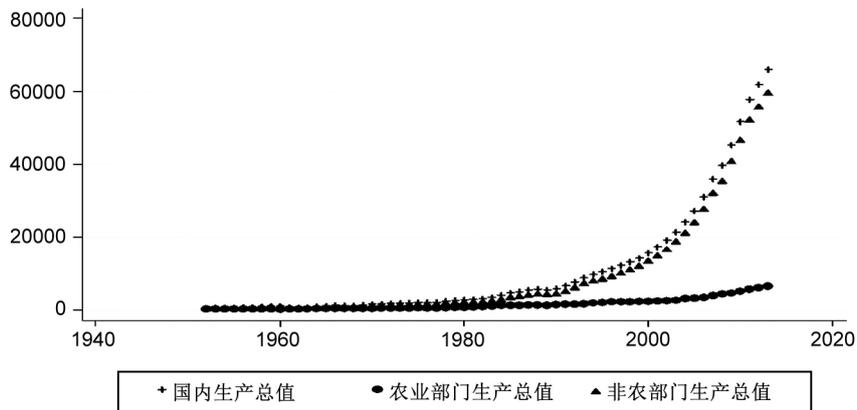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部门生产总值(1952—2013)

(五) 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的实证分析

1. 参数校准

首先,我们需要对理论模型的一些参数进行校准分析(calibration)。根据反事实分析(counterfactual)的假设,需要估算出不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下,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就业份额增长率 $g_{\delta r}$ 和 $g_{\delta u}$,以及农业部门、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和产出的增长率 α_0 、 β_0 和 $g_{y_a^0}$ 、 $g_{y_{na}^0}$ 。事实上,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城乡劳动力流动量为零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无法观测到真实的 $g_{\delta r}$ 和 $g_{\delta u}$ 、 α_0 和 β_0 。通过观察图 1 发现,1962—1975 年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非常小(年均转移率小于 1%),因此,我们把这段时期(近似地)视为无劳动力转移的情形,用该时期两个部门的就业份额、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率作为 $g_{\delta r}$ 和 $g_{\delta u}$ 、 α_0 和 β_0 、 $g_{y_a^0}$ 和 $g_{y_{na}^0}$ 的近似值,参数校准的结果为: $g_{\delta r} = -0.38$ $g_{\delta u} = 1.63$ $\alpha_0 = 4.43$ $\beta_0 = 4.71$ $g_{y_a^0} = 7.09$ $g_{y_{na}^0} = 9.98$ 。

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核算结果

本文理论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影响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份额的增长率,而且还会作用于权重参数,进而影响总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的增长率。根据 1952—2013 年相关统计数据,本文理论模型中一些核心指标和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的估算结果见表 1。1952—2013 年两个权重参数 θ_1 和 θ_2 的均值分别为 27.43% 和 73.56%,其中, θ_1 呈现下降趋势,而 θ_2 则呈现上升趋势,表明总劳动生产率构成中,农业部门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非农部门的重要性逐步上升。

1953—2013年总产出(GDP)年均增长率为8.36%,其中,改革开放前总产出增长率为6.09%,改革开放后增至9.86%。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相似路径,1953—2013年年均增长率为6.05%,1978年之前增长率仅为3.29%,而1978年以后跃升至7.90%。总就业人口增长率则呈相反变化趋势,1953—2013年均值为2.21%,从改革开放之前的2.63%降至改革开放之后的1.91%。分部门比较,样本期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均值为5.43%,非农部门为9.72%,改革开放之前二者分别为3.53%和8.29%,改革开放以后二者分别上升至6.74%和10.61%。农业部门就业份额增长率为负值(-1.46%),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农业部门就业份额下降得更为明显,与此相反,非农部门就业增长率为正,1953—2013年的年均增长3.30%。改革开放前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增幅较大,从1.54%上升到7.3%。与此同时,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表1 模型主要参数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核算

项目(单位:%)	1953—2013	1953—1977	1978—2013
权重参数(θ_1)	27.43	37.56	19.89
权重参数(θ_2)	73.56	62.44	80.11
总产出增长率(g_Y)	8.36	6.09	9.86
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_A)	6.05	3.29	7.90
总就业人口增长率(g_L)	2.21	2.63	1.91
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Y_a)	5.43	3.53	6.74
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率(Y_{na})	9.72	8.29	10.61
农业部门就业份额增长率(g_{δ_a})	-1.46	-0.18	-2.27
非农部门就业份额增长率($g_{\delta_{na}}$)	3.30	3.97	2.46
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_{Aa})	5.00	1.54	7.30
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_{Ana})	4.94	3.73	6.02
劳动生产率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C_A)	72.36	53.99	80.11
就业人口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C_L)	26.41	43.14	19.41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C_{TAa})	12.91	-65.26	64.74
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劳动生产率的贡献(C_{TAna})	4.81	-20.90	27.91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C_{Y_{Aa}}$)	8.07	-40.77	40.45
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产出增长的贡献($C_{Y_{Ana}}$)	2.27	-9.86	13.18
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的贡献(C_{TA})	20.43	-4.88	24.26
劳动力转移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C_{TY})	14.78	-2.64	19.43

注:计算各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将导致样本减少一年,即1952年的增长率指标缺失。

1953—2013年总产出增长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贡献了72.36%,就业人口的增长贡献了26.41%,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而就业人数的贡献逐步下降。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均为正值,对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高于非农部门(12.91%和4.81%),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均为负值(-65.26%和-20.90%),而改革开放以后二者均为正值(64.74%和27.91%),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改革开放前绝大多数年份农村劳动力转移量非常少,唯一大规模转移出现在“大跃进”时期,然而这一非市场需求引发的“非农化转移”导致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下降,因此,该时期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为负^①。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制所释放出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1980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表现为就地转移和农村工业化,90年代开始逐渐转向跨地区转移和民工向沿海地区集聚),提高了劳动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了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的贡献与其对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相似,改革之前贡献为负,改革之后为正。1953—2013年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0.43%和14.78%,改革开

^① “大跃进”运动时期,中国农村大炼钢铁,然而炼钢并没有建立在农村工业化的基础上,缺乏炼钢设备和科学的炼钢方法,技术不符合规格,绝大部分地区生产只炼出了大量的废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向生产钢铁,导致农业生产出现了大滑坡。

放之前二者为-4.88%和-2.62% ,改革开放以后增至24.26%和19.43% ,即相比于没有劳动力转移的基准情形 ,劳动力转移(期间年均转移量超过1亿人次)使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提升了24.26% ,总产出增长率提升了19.43% 。我们将样本期细分为改革开放前(1953—1977)、改革开放后(1978—2013)以及新世纪以来(2001—2013)三个历史时期^① ,结果显示 ,新世纪以来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变得更大了 ,其中 ,劳动力转移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高达164.06%和102.51% ,出现这一异常高的贡献率的潜在原因在于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未考虑到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财政支农、经济波动等外生冲击的效果 ,将这些影响农业发展的外生冲击的贡献也归因于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3. 与模型的简单情形和其它研究的比较

本文两部门经济模型中的一个核心设定在于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会影响各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动 ,而且还会对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产生影响。我们将前文的实证结果与本文模型中的简单情形、以往的研究进行横向比较 ,具体比较结果见表2。为了便于对比 ,我们将上文实证部分的核心结果列于表2的最上方。如果假设各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仅由劳动力转移量决定(忽略各部门自身人口因素的影响) ,并且假设劳动力转移不影响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这类似于张广婷等(2010)的设定 ,其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影响与本文的估算结果显著不同。1953—2013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32.95%和23.84%。分时期看:1953—1977年两项贡献分别为73.40%和39.63% ,而本文模型设定下两项贡献在该时期均为负值(-4.88%和-2.64%);1978—2013年两项贡献分别为19.28%和15.44% ,稍微低于本文的估计结果;2001年以后两项贡献降至16.00%和15.24% ,远远低于本文估计的44.58%和42.46%。本文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确会影响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进而影响总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因此 ,忽略了这一影响渠道势必造成劳动力转移贡献的估计出现偏误 ,表2中两种假设下的比较证实了这一论断。忽略了劳动力转移对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使得相关估计结果出现严重偏误 ,即过度高估了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引致的)劳动力转移的贡献^② ,而低估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所引导的)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将本文的估计结果与张广婷等(2010)的估计结果进行横向比较 ,为了确保时间上的可比性 ,我们估算了1997—200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 ,该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39.24% ,高于张广婷等(2010)估算的16.33%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总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为35.41% ,远大于张广婷等(2010)估算的1.72%。本文的模型与张广婷等(2010)的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 ,本文设定了“没有劳动力转移”这一基准情形 ,通过比较实际情形与基准情形的差异来估算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贡献 ,并假设劳动力转移能够通过作用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来影响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也将估计结果与齐明珠(2014)的估计结果进行横向对比 ,为了与其保持一致 ,将时间限制在1990—2011年。该时期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38.28% ,大于齐明珠(2014)估计的23.9% ,劳动力转移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33.06% ,低于齐明珠(2014)估计的63.7%。齐明珠(2014)和本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1)齐明珠(2014)对经济增长(核算)进行分解时包含了劳动利用效率(就业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这个因素的贡献 ,而本文未包含这一因素。(2)数据来源不同。齐明珠(2014)采用的是世界银行数据库 ,许多变量都是通过估算得出 ,而非利用实际统计值 ,比如就业人口是通过劳动人口和失业率计算得出 ,各产业增加值和产业就业人口都是通过产业份额和产业就业人口份额与总GDP和总就业人口计算得出。(3)对基准情形的假设不同。齐明珠(2014)关于“没有农村

^① 如果读者感兴趣 ,可直接联系作者查看相关附表。

^② 比如 ,“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实际上造成了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下降 ,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忽略这一影响将高估该时期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贡献。

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假定是 将实际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从就业人口中剔除 ,即假设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转移到二、三产业 ,而是凭空消失了 ,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就业份额。

表2 本文估计结果与简单情形、其它类似研究的比较

	1953—2013	1952—1977	1978—2013	2001—2013
假定 1: 劳动力转移既影响部门就业份额 ,也影响部门劳动生产率				
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C_{TA})	20.43	-4.88	24.26	44.58
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 (C_{TY})	14.78	-2.64	19.43	42.46
假定 2: 劳动力转移仅影响各部门就业份额 ,不影响部门劳动生产率				
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K_g)	32.95	73.40	19.28	16.00
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 (K_Y)	23.84	39.63	15.44	15.24
比较 1: (1997—2008)				
	本文结果		张广婷等(2010)	
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39.24		16.33	
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	35.41		1.72	
比较 2: (1990—2011)				
	本文结果		齐明珠(2014)	
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38.28		23.9	
对总产出增长的影响	33.06		63.7	

四、主要结论和启示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经济模型 ,在增长核算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既会改变各部门的就业份额 ,也会作用于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进而对整体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造成影响。通过设定“没有劳动力转移”这一基准情形 ,并对比存在劳动力转移的真实情形和基准情形之间的差异 ,我们估算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贡献 ,主要结论如下:

(1) 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非农部门就业份额的增长率(3.30%) ,使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不断下降(-1.46%) ,改革开放以后 ,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的降幅更为明显(-2.27%)。

(2) 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影响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但其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在不同阶段截然不同。计划经济时期非市场机制引致的劳动力转移对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引导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显著提高了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3)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产出增长的影响与其对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相似 ,改革开放前、后存在明显差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发生的劳动力转移对两个部门的产出增长均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而改革开放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两部门产出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 ,其正向贡献不断增加。

(4)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和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20.43% 和 14.78% ,改革开放之前其贡献为负(-4.88% 和 -2.62%) ,改革开放之后的贡献为正(24.26% 和 19.43%) ,21 世纪以来劳动力转移的贡献显著提高 ,分别增至 44.58% 和 42.46%。

21 世纪以来总就业人口增长率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 2.6% 左右降至 0.5% 左右 ,并且经济增长中就业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因此 ,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发现 ,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改善劳动力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配置 ,促进了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从而为总产出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并且贡献程度呈递增趋势。因此 ,政府应该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便利 ,包括为流动人口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 ,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适时适度地推进城市化 ,通过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 ,支持城镇中小企业发展。同时 ,也应该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 ,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地区繁荣。

参考文献:

- 蔡昉,王德文,都阳. 2001. 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 中国社会科学(2):4-14.
- 陈朔,冯素杰. 2005. 经济增长速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J]. 南开经济研究(5):45-47.
- 杜鑫. 2010. 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村居民经济福利的影响[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段均,杨俊. 2011. 劳动力跨部门配置与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8):53-64.
- 樊士德. 2014. 中国外流劳动力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微观调研的经验分析[J]. 新疆社会科学(2):116-125.
- 龚玉泉,袁志刚. 2002.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制[J]. 经济学动态(2):36-39.
- 胡永泰. 1998.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 经济研究(3):31-39.
- 李俊峰,王代敬,宋小军. 2005.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研究:两者相关性的重新判定[J]. 中国软科学(1):64-70.
- 李实. 1997. 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 经济研究(1):23-30.
- 李勋来,李国平. 2005. 经济增长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 经济科学(3):40-43.
- 潘文卿. 1999.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测评[J]. 统计研究(4):31-34.
- 齐明珠. 2014.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量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4):127-153.
- 姚枝仲,周素芳. 2003.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J]. 世界经济(4):35-43.
- 张广婷,江静,陈勇. 2010. 中国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10):15-23.
- ALFARO L, CHARLTON A, KANCUK F. 2009. Plant - Size distribution and cross - 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060.
- BANERJEE A V, DUFLO E. 2005. Growth theory through the le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M]//AGHION P, DURLAUF S 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Elsevier:473-552.
- 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ZHANG Y. 2009.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 - 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R].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152.
- CASELLI F. 2004. Accounting for cross - 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 [J]. Lse Research Online Documents on Economics, 1(5):679-741.
- HARRIS J R, TODARO M P. 1970. Mitig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 sector analysi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126-142.
- HSIEH C T, KLEINOW P J.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1403-1448.
-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J].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139-191.
- 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3-42.
- RANIS G, FEI J C H. 1964.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J]. Economic Journal, 77(306):480-482.
- ROMER P.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5):71-102.
- SOLOW R. 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65-94.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and Economic Growth

LI XuHui PENG XianMei MA ChengWe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two - sector economic model,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Chines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on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angel of economic growth accounting fram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on the whole society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otal output growth are 20.43% and 14.78%.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Under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that was caused by administration order on the whole society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otal output growth was negative. But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ness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that was caused by market mechanism on the whole society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otal output growth was positive, and the rate shows the tendency of rapid growth. Therefore, in order to promote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the government can make efforts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medical system, social security,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Keywords: labor transfer; labor productivity; employment share;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 彭江)